



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 传教”研究 (1552-1773)

A Study of Catholic Proselytizing by Means
of Books from the mid-Ming Dynasty to the
mid-Qing Dynasty(1552-1773)

伍玉西 著



人民出版社

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 传教”研究 (1552-1773)

A Study of Catholic Proselytizing by Means
of Books from the mid-Ming Dynasty to the
mid-Qing Dynasty(1552-1773)

伍玉西 著

责任编辑:都基隆 官 共

封面设计:毛 淳 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伍玉西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7149-4

I. ①明… II. ①伍… III. ①基督教史—研究—中国—1552—1773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6711 号

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

MINGQING ZHIJI TIANZHUJIAO SHUJI CHUANJIAO YANJIU

1552—1773

伍玉西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23 千字

ISBN 978-7-01-017149-4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基督教历史上的传教方法与“书籍传教”的含义	2
第二节 本课题的国内研究状况、研究目的及意义	8
第三节 传教的特性与本课题的研究视界	14
第二章 “书籍传教”的兴起	21
第一节 传教士东来与耶稣会对华文化适应政策的形成	21
第二节 耶稣会士的“西儒”身份与“儒士归化”传教战略	29
第三节 面向儒家士人的“书籍传教”	40
一、利用西洋图书的外在吸引力	40
二、借助“天学”书籍的学术影响力	43
三、发挥书籍的信息传播优势	47
本章结语	56
第三章 传教士“天学”书籍的著译缘起与过程	58
第一节 宗教类书籍	58
一、经仪文	59
二、教会历史	64
三、基督教伦理	69
四、神学	77
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类书籍	87
一、自然哲学	87
二、逻辑学	89
三、语言文学	90
四、心理学	93
五、伦理学	94
六、教育学	98
七、音乐	100

第三节 自然科学与技术类书籍	100
一、数理	100
二、天文历法	106
三、地理地学	111
四、机械矿冶	115
五、生物医药	120
本章小结	121
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张力及传教士会通二者的努力	125
 第四章 传教士“天学”书籍的刊印与流布	138
第一节 刊印种类	138
第二节 教会的出版管理	149
第三节 书籍的刊印者	160
一、传教士刻印	161
二、中国天主教徒刻印	165
三、教外人士刻印	171
第四节 中国士人的序、跋	176
第五节 流布形式	188
一、教徒自印	188
二、作为礼品赠送	188
三、散发	191
四、销售	197
五、借阅	198
 第五章 中国士人的回应	199
第一节 从惊羨到幻构	199
一、对“番书”的惊羨	200
二、对“西儒”的倾服	204
三、对“西邦”的幻构	210
第二节 宗教皈依	212
一、“天学”书籍引发的信教故事	212
二、士人天主教信仰与“天学”书籍的关系	223
第三节 反教、护教与禁教	227
一、明末“南京教案”	227

二、《圣朝破邪集》与《辟邪集》.....	231
三、1644 年成都仇教事件	237
四、清初“历狱”	238
五、清政府的禁教	243
第四节 中国士人对“天学”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247
结 论	260
附 录	263
参考文献	269
后 记	283

第一章 绪 论

1613年,在华传教的比利时籍传教士金尼阁受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龙华民的派遣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部报告中国传教区会务,以唤起欧洲对中国传教的关注和支持。金尼阁的欧洲之行在中国天主教史上是一件大事,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龙华民交付的任务,而且巡游欧洲各地,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募集到了7000余部图书^①,他这样描绘这批图书:

余迄今所获者,无论就数量言(重复者不计),就学术门类之繁多言,就装潢之富丽言,在耶稣会中尚无足以与此颉颃者。……以学科之门类言,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日所已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余从各王公大臣所征集及在各地所收购之各项测算仪器与制造仪器之机械,种类之多,品质之精,可谓已一无所缺,若欲一一缕述,则未免太长矣。余愿为君等一言者,即此一书藏与仪器,在离欧前值一万金币。若论其精美,则所有书籍均以红皮装订,一面有教宗御玺,书名并其他花饰,均烫金。余并尽量设法,使所有书籍均为大本。^②

金尼阁搜集这么多的西洋书籍,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教会图书馆,他说:“成立图书馆,乃最萦余怀者,几无一事较此更使余念念不忘也。”^③建立教会图书馆本不稀奇,但令人费解的是,金尼阁募集的这批书,不仅有宗教类书籍,而且有大量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类书籍。传教士是来传教的,他带来这么多与宗教毫无关联的图书,且装订极其考究,他是要干什么呢?

① 近有学者对这批书是否有7000部提出了质疑,参见计翔翔《金尼阁携西书七千部来华说质疑》,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四十一辑,1996年版,第153页。经过近400年的岁月沧桑,这批书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计有757种,629册,参见拓晓堂《北堂善本书概述》,《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114页。

② 1617年1月2日金尼阁书信,转引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44页。

③ 1617年1月2日金尼阁书信,转引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第44页。

原来,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清之际的中国采取了一种利用书籍来达到传教目的的方法,即“书籍传教”方法,金尼阁的“七千图书事件”就是“书籍传教”的一个组成部分。

既然有“书籍传教”的提法,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首先必须对这个概念加以必要的辨析。其次,“书籍传教”作为一种传教方法,是首创还是沿用?对后来的传教有什么影响?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状况如何?本章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确定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此外,由于传教活动的特殊性,本课题的研究视界也是必须要首先交代的。

第一节 基督教历史上的传教方法与 “书籍传教”的含义

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注重传教是它的一大特点。要想取得好的传教效果,离不开适宜的方法。早在耶稣创立基督教时,传教方法问题就已经表现了出来。公元1世纪初,来自社会底层的犹太人耶稣通过改革犹太教而初创基督教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他“以爱上帝爱邻人为内容的虔敬思想代替了当时强调外在形式、讲求善功以及注重宗教仪式的犹太教思想”^①。为了让本民族的人民接受他的新观念,他使出了不少招数。据《圣经》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犹太等地巡游布道,或进入圣殿、会堂,或走进家庭;或面向数千人进行大型演讲,或与单个人面对面对交流;或用话语引导,或用行为开示。在耶稣的传教方法中,最能吸引人的是施行超自然的神迹奇事,诸如变水为酒、医病赶鬼、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死人复活、海面行走、登山变像等等。行神迹奇事对于耶稣取得传教成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很多人因此而相信他就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盼望的那位救世主弥赛亚。

耶稣升天后,他的门徒分散到罗马帝国各处,利用帝国境内便利的交通网络巡游布道。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内产生了一位伟大的布道家保罗(约公元5—64年)。他一生有过三次旅行布道,足迹遍布巴勒斯坦、小亚细亚、马其顿、罗马等地。保罗和其他使徒,如彼得、约翰等人,以罗马帝国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举行公开演讲和辩论的形式向帝国境内各民族的人传教,也偶尔行些神迹。自公元1世纪下半叶开始,基督徒开始受到罗马当局

^① [美] 威利斯顿·沃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朱代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的残酷迫害,但他们以“毫不容人的狂热情绪”,“纯真、严谨的品德”,以及前赴后继的殉道行为战胜了帝国境内所有的宗教。^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殉道者的鲜血为教会赢得了不少新的皈依者。^②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随后罗马社会完成了基督教化。

公元6—14世纪,整个欧洲逐渐皈依了基督教^③,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武力征服、外交途径和托钵僧式的努力来完成的。^④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承担了教化蛮族王国的任务,“并使其在铸造新的日耳曼社会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⑤。罗马公教会在日耳曼人中的传教活动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采取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通过劝化国王信教带动臣民信教,认为只要国王信了教,他的臣民“或出于对国王的爱戴或出于对国王的惧怕,都服从信仰和贞洁的章法”;第二,在传教方法上通过行“神迹奇事”来传教,据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的记载,传教士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大行基督教神迹,教会“通过彰显许多神迹而赢得了英吉利人的内心”^⑥。东正教在斯拉夫中的传播也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基辅罗斯公国大公弗拉基米尔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把基辅居民一群群赶下第聂伯河,接受希腊神父的洗礼,原来的神像被烧毁或扔进大河里,如有不从,将被视为敌人,“基督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了基辅罗斯公国”。随后东正教会在基辅设立了都主教,在斯拉夫人中建立了一批主教区,教会与王公、贵族、领主、富商联合起来进行封建统治。因世俗王权统治的需要,“王公们采用各种方法支持教会发展教徒,甚至使用强制手段,使广大居民皈依东正教”^⑦。随着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和日益强大,以及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东正教会积极配合其对外扩张,且借助国家之力强迫被征服地区的民族改宗,东正教得到进一步的传播。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在土耳其统治区域内,基督教的传播极其困难,“但东正教徒的见

①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D.M. 洛节编本)上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4—235页。

②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③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II,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8, pp.20-21.

④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Second Edition), Vol.9, Thomson/Gale;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2003, p.691.

⑤ [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第60页。

⑥ [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2、87页。

⑦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50页。

证让教会在压迫他们的人中赢得了一批皈依者”^①。

15 世纪后期,西欧人开始了海外扩张,罗马教廷与西班牙、葡萄牙人联手,掀起了基督教历史上新一轮传教运动。教皇授予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新发现的“异教”土地上享有“保教权”,两国国王全权负责那里居民的宗教生活,为传教提供经费和运输上的便利,并保护教会。在西属美洲,西班牙人强行捣毁印第安人的偶像,另建祭坛,摆上圣母像,树起十字架,随军神父随即在各村落布道,给婴儿施洗,“由于不断地向他们布道,圣教教义已在他们心中扎根”^②。为了给那些“头脑简单的人留下深刻的影响”,神父们不惜工本举行场面恢宏壮观的弥撒仪式,建造五彩缤纷的教堂。^③他们还在当地进行文明开化,教当地人耕种,建立学校,开设拉丁文、美术、音乐等类的课程。^④当这些西班牙“斗牛士”来到菲律宾后,采取同样的手段征服了当地人的精神世界。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征服活动也与西班牙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宗教精神,且在印度果阿建立了宗教法庭。^⑤但葡萄牙毕竟小国寡民,处于葡萄牙“保教权”下的各修会传教士不得不实行适应当地文化的传教政策,并采取相应的传教手段和方法。例如,在葡萄牙印度领地科钦、马德拉斯、马杜赖和果阿等地,传教士们除举行公开的布道活动外,还开办医院,接济穷人,并因此而有“大量的人皈依基督教”^⑥。

在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士紧随葡萄牙商人的脚踪来到了中国。在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传播。第一次是唐代的景教。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波斯的聂斯脱利派^⑦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长安传教。阿罗本传入的基督教派别在中国被称为景教。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景教在唐代曾有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在传教方法上,景教徒一方面紧紧依傍皇权,另一方面试图借助于德行。他们“和而好惠”“闻道勤行”“依仁施利”,“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

①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Second Edition), Vol.9, p.694.

② [西]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下册,江禾、林光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283 页。

③ [英]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第 259 页。

④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Second Edition), Vol.9, p.692.

⑤ [印度] 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 1997 年版,第 92 页。

⑥ [英]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第 262 页。

⑦ 聂斯脱利,叙利亚人,公元 5 世纪君士但丁堡的一位大主教。他的基督“二位二性”论在公元 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定为异端,他本人被革职,遭流放。他的支持者在东方传教,所形成的基督教派别被称为“聂斯脱利派”。

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①但景教在中国根基不稳,200余年后受唐武宗灭佛(公元845年)牵连,很快在中国境内消失。第二次是元代的“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是对元帝国辽阔版图内景教与天主教的总称,信奉者主要是蒙古贵族和色目人。他们曾在江南一带“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将法策先生诱化”,也曾“以医为传道之具”。^②元帝室被逐出北京后,“也里可温”在中土匿迹。1552年,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沙勿略来到广东台山的上川岛,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天主教的对华传教。1583年9月,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定居肇庆,突破了传教士困居澳门一隅的限制,天主教对华传教取得实质性进展。随后其他传教士纷至沓来,在明清之际的中国掀起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传教运动。在这一时期,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天主教传教士为了有效吸引和归化中国人,使出了不少手段,如给中国皇帝和官员奉献“方物”、服务宫廷、行“神迹”传教、“医药传教”“书籍传教”等等,其中使用最广和最有成效的莫过于“书籍传教”了。

何谓“书籍传教”?顾名思义,即借助于书籍的作用来达到传教的目的。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使用了“proselytizing by means of books”^③的表述,直译为“借助书籍来让人改宗”。在西方文化中,“proselytizing”一词内含有“皈依基督”之意。约翰·彼得(Johannes Bettray)在《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在华适应方法》(*Die Akkommodationsmethode des P. Matteo Ricci S. I. in China*)一书中使用了“Apostolat der Presse”^④的表述,直译为“通过出版物来承担使徒之职分”。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说:“我们从他(指耶稣——作者注)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⑤使徒有传教的职责,“通过出版物来承担使徒之职分”可以转译为“书籍传教”。在这两种表述中,前者侧重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后者侧重于主体的职责。这两种表述有助于对“书籍传教”的理解,但不足以涵盖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的全貌。

① 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5页。

②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12页。

③ Nicolas Standaert, “Note on the Spread of Jesuit Writing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an”,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VII (1985), p.22.

④ Johannes Bettray, *Die Akkommodationsmethode des P. Matteo Ricci S. I. in China*, Romae: Apud Aedes Universitatis Gregorianae, 1955, p.181.

⑤ 《新约·罗马书》第1章第5节。本书《圣经》译文采用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的1996年《中文圣经启导本》简体字版。

明清之际在华传教士借助书籍进行传教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展示西洋图书,以此证明基督教来自文化昌明的地区,减轻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阻力;第二,撰写中文作品,翻译西文书籍,以此证明传教士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为传教创造有利条件;第三,通过中文书籍的流布来发挥其信息传播作用,以此来传播基督教的信仰、教理、礼仪和伦理等。前两个方面是利用书籍的外在影响,改善传教环境,为传教开辟道路,起间接传教作用,第三个方面是利用书籍来进行直接传教。因此,在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那里,书籍不仅是一种宗教信息传播媒介,而且成了一种彰显西洋文明与传教士自我证明的外在传教手段。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书籍传教”作如下界定:“书籍传教”是指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通过展示西洋图书以及撰写、刊印中文书籍,发挥它们的外在影响力和内在的信息传播作用,以此来吸引、归化中国人的一种传教方法。^①

因“书籍传教”是无声传教,所以法国学者裴化行(Henri Bernard)将其称为“哑式宣教法”^②。他的这种提法来自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在1702年11月26日写的一封书信。傅氏原文是说传教士的中文书籍是“静默的传教者”(silent preachers)^③。傅氏说书籍是“静默的传教者”,这是成立的,但如果反过来用“哑式传教”来指称“书籍传教”,就会落入指代不明的陷阱。国内惯常的提法是“学术传教”。清末民国时期著名天主教徒马相伯倡导“学术传教”,其本意是借用本地的学术资源来传教。^④后来的学者借用这种提法,用指明清之际传教士的一种传教方法,其含义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伦理和宗教思想(所谓学术)吸引中国士大夫。”^⑤“学术传教”的提法突出了西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给书籍的定义是:“书籍是用文字、图画和其他符号,在一定材料上记录各种知识,清楚地表达思想,并且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为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积累人类文化的重要工具。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书写方式、所使用的材料和装帧方式,以及形态方面,也在不断变化与变更。”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根据这一定义以及明清之际传教士利用书籍进行传教的实际情况,本书所涉及的“书籍”包括以文字作为书写符号装订成册的文字书以及有文字说明的图画书。图画书有两种装订形式,一种是图、文各占一部分版面,装订成册的画册;另一种是其间杂有长篇文字说明,装订成卷的图画,如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② [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萧潜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1页。

③ 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Ra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2, p.116.

④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9页。

⑤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5页。

方学术(包括世俗学术与宗教,在明清之际被统称为“天学”)在传教中的作用,但不直接涉及传教媒介。因此,这两种提法都不足以全面表达借助书籍来达到传教目的的“书籍传教”的含义。

书籍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与基督教早有关联。据《圣经》记载,在旧约时代,当摩西举起神杖击败亚玛力人之后,上帝对他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①;到了新约时代,上帝又对使徒约翰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②。为了用耶稣神奇的一生以及独特的教诲来训诫后人,耶稣的门徒留下了福音书。保罗与各地信徒通信,以书信来牧养教会。早期教父们面对罗马当局的迫害、一般民众的误解以及知识阶层的攻击,通过撰写书籍的方式来捍卫基督教信仰。在现代印刷术产生后,欧洲涌现出大批印刷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印刷《圣经》、布道文和其他宗教书籍,“通过印刷品,教会规范了礼拜仪式和教理,以更为低廉的成本把宗教信仰传播给大众”^③。总之,在基督教历史上,书籍承担了记载上帝启示、规范教理、表达信仰、为教会辩护、作为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功能。然而,把书籍作为一种在“异教徒”中传播福音信息的主要手段,则最早出现在明清之际的中国。钟鸣旦指出,出版和印刷业的繁荣对基督教在晚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书籍传教’成为在社会精英中传播基督教的主要方法”。^④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也说,在明清之际,“‘天主教’知识和传教士们传入的其他新鲜事物,主要是通过书籍在中国传播的”。而同期即使在文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印度,由于“缺乏任何方便实用的印刷手段,那里的任何布教活动均系口传”。在日本,虽然中文书交易很繁荣,但“木刻版书似乎对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只起了不太重要的作用”。^⑤

通过以上对基督教传教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基督教的传播要么通过以武力或政权为后盾的强制方式,要么通过以理服人的和平劝说方式。而在众多劝人皈依的和平方法中,在基督教传入明代中国前,还没有出现过把书籍作为奇物、以著书作为手段来外证福音的现象。所以,可以大胆地说,

① 《旧约·出埃及记》第17章第14节。

② 《新约·启示录》第1章第11节。

③ Daniel A. Stout ed.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6, p.45.

④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 Boston · Köln: Brill, 2001, p.600.

⑤ [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史料来源》(增补本),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融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于一体,把书籍的传教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的“书籍传教”,是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清之际中国使用的一种新式传教方法,在基督教传教史上是一个创举。

18世纪后期,新教的海外传教运动兴起。传教士们在广大传教区建立学校、医院以及训练医生和护士的培训中心,将许多的语言和方言变为书面语,除了《圣经》外还把西方其他作品翻译成这些语言,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改进农业技术,等等,“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活动与领人归信的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①。单就利用印刷品传教而言,他们除了散发布道单张、小册子,赠送书籍之外,还在传教区内设立出版机构,开办印刷厂,创办近代报刊,等等。时至今日,文字事工仍是基督教各派诸多事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电子书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基督教内的纸质出版活动仍然十分活跃,美国现有近300家宗教出版社,其中有200余家属于基督教的。^②由此看来,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书籍传教”在基督教传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基督教会充分发挥印刷品传教作用的新时代。

第二节 本课题的国内研究状况、研究目的及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传教组织有耶稣会、多明我会(又译为道明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遣使会(又译为拉匝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及罗马教廷传信部^③,其中以耶稣会来华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是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的中坚力量。进入雍正朝,清政府开始禁教,且措施越来越严厉,在此不利环境中,耶稣会士还能想方设法让天主教在中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廷被迫取缔耶稣会(教皇谕令在两年后传到中国),耶稣会在中国的教务由遣使会接管。但遣使会无法替代耶稣会的作用,中国天主教走向衰败势在难免。因此,从耶稣会士踏上中国土地的1552年与耶稣会被解散的1773年是明清之际天主教具有划界意义的两个年份,它们前后相继,构成基督教这一次在中国传播比较完整的历史阶段。

从罗明坚开始,明清之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留下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中

① [美]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刘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② Daniel A. Stout ed.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p.47.

③ 传信部除了主要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招募来华传教士外,还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和遣使会等除耶稣会之外的其他修会中招募人员。

文“天学”书籍。这批书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很难作出准确统计。法国学者裴化行统计的1584—1727年的天主教传教士中文著作为623种。^①钟鸣旦认为,在17世纪,除了大约130种介绍西方和西方科学的书籍外,能确认的有关宗教和伦理的著述大约有470种(大多数保存完好),作者330人。^②李天纲根据现在罗马、巴黎、里斯本、上海、台北等地收藏处公布的目录估计认为,“目前存世的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文献约有千种”^③。张西平教授告诉笔者,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有1200部,目前中国学者能看到的大约有300部。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推定这批中文书的数量应不下1000种。

明清时期的丛书,如《天学初函》和《四库全书》,部分辑录过这批文献,1949年后台湾的一些出版机构陆续辑录出版了这批文献中的一部分。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影印出版了在明末编辑而成的《天学初函》,成为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第23种。吴相湘主编有《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由台湾学生书局分别于1964年、1965年、1984年影印出版。钟鸣旦、杜鼎克(Adrian Dudink)、黄一农、祝平一编有《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由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影印出版。钟鸣旦、杜鼎克主编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由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影印出版。钟鸣旦、杜鼎克、蒙曦(Nathalie Monnet)编辑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由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影印出版。由钟鸣旦、杜鼎克、王仁芳编辑的《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台北利氏学社2013年出版。大陆也有相关的出版活动:郑安德编有《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2000年由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内部刊印,共收录明清之际传教士与中国士人的相关著述70种。陈占山校注了杨光先的《不得已》,并附录了利类思等人的《不得已辩》和南怀仁的《历法不得已辨》,2000年由黄山书社出版。朱维铮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收录了利玛窦的全部中文著述,200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周骥方编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收录了4种天主教中文文献(《辨学遗牍》《代疑篇》《三山论学记》《天学传概》),3种反天主教文献(《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2001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王美秀、任延黎主编

①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0页。

②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p.600.

③ 李天纲:《书评:钟鸣旦、杜鼎克主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第347页。

了《东传福音》，收录了自唐以来的一批基督教中文文献，共24册，第1册到第11册是天主教部分，2005年由黄山书社影印出版。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由周岩编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新编》，共3册，辑录了明清之际传教士与中国士人的演教、反教文献40种。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黄兴涛、王国荣编的《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黄曙辉点校了《天学初函》，分4册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叶农点校整理了耶稣会士苏如望、罗儒望、毕方济、孟儒望的中文著作共11种，由齐鲁书社2014年出版。2014年，大象出版社推出了张西平、任大援、马西尼等人主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44册，170种文献。还有一些传教士的科技和人文社科类书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如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傅汎际的《名理探》、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汤若望的《火攻挈要》，利类思等人的《西方要纪》等。

这批文献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政治学、逻辑学、语言文字学、文学、音乐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等众多的学科和领域，“从经院式的哲学到以羽管键琴伴奏的田园牧歌，无所不有”^①，研究中国天主教史以及那一段中西文化交往的历史必然会涉及这批文献，介绍和研究传教士以及中国天主教徒同样离不开这批著译，所以它们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从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传播学、诠释学等视角对它们进行研究，或进行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或从事内容注疏和版本研究，或探讨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关于这批文献与传教之间的关系，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人注意到了。明末信教官员杨廷筠说：“西士引人归向天帝，往往借事为梯，注述多端，皆有深意。”^②《明史》云：传教士“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③。《四库全书总目》在评论利玛窦所著《二十五言》时说：“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④而对“书籍传教”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则是民国之后的事了。1930年6月《青年会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中刊登了陈垣的《基督教入华史》一文，该文总结了利玛窦在华传教成功的“6个条件”，其中有两个与“书籍传教”有关，即“介绍西学”

① [荷]许理和：《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研究》，辛岩译，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页。

②（明）杨廷筠：《职方外纪序》，载（明）李之藻辑《天学初函》第三册，（台）学生书局1978年影印本，第1296—1297页。

③（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传》。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五，《二十五言》。